

论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在逻辑

穆艳杰 廖 婧*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是由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的。本·阿格尔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不足,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提出了以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思想,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异化消费。阿格尔同时还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开启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分析,旨在厘清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而把握阿格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局限性。

〔关键词〕 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这本书中,阿格尔第一次使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并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理解,并且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思想,所以他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异化消费,而生态危机与异化消费则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思想,并赞同威廉·莱斯等人的“稳态经济”方案,最终阐发了将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结合的目的,充分彰显了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也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走向变革的思想契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

阿格尔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为逻辑起点的。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主要分成异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危机理论三个组成部分。阿格尔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是通过深入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而阐发的。首先,阿格尔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研究,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和异化劳动思想,即“异化是指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

* 穆艳杰,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婧,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130012。本文是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0YZA710046)、吉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3A03)成果之一。

支配其劳动,反而被其劳动和追逐利润的制度的需要所支配的一种状态”^①,进而得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异化存在的前提,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存在,使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存在的结论。他分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特征,赞同马克思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克服私有财产、解决异化问题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革命进行反抗的实践力量。其次,阿格尔还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认识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竭力用真实的意识代替虚假的意识来揭露意识形态的真相”^②。再次,阿格尔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③这一思想观点作了分析,指出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实践的概念,是“把革命实践的结构方面和主观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明确揭示了马克思辩证法的非决定论的性质”^④。最后,阿格尔通过对马克思晚期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强调马克思所说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会造成局部破坏,甚至会面临彻底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迫使工人阶级进行反抗,从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探求人类的解放之路。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的内在矛盾就是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矛盾,资本家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得异化劳动程度不断加深,从而导致了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阿格尔认为,前两个方面的内容不仅构成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支柱,并且,对资本主义的充分了解也是建立在对异化的分析和“内在矛盾”的分析基础上的。所以,马克思辩证法特性在于阐发了一个思想,“即人类将创造一个具有其自身存在的特征并趋于崩溃(由于其内在矛盾的成熟)的社会制度”^⑤。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不是决定论也不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者认为内在矛盾和相应产生的危机趋势(如经济萧条、高失业率、趋于下降的利润和工资)是如此严重,以致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也会‘自动地’解体”^⑥。显然,这种观点认为危机是必然产生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意志论则认为危机不是必然产生的,即使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危机趋势的分析,人类也要解放自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有意识的阶级斗争觉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观点往往在资本主义制度遭受严重危机和内部矛盾尖锐的情况下盛行,而在矛盾有所缓解和危机没有发生或者摆脱了危机困扰的繁荣时期会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意志论。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仅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而未经系统阐述的危机模式揭示了异化了的工人最终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并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成熟及其表现所产生的各种危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没有异化的社会主义制度”^⑦。并且,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马克思认为矛盾会导致危机的出现,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能够导致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实际到来必须要工人阶级通过不断的斗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石,即处于异化中的工人只有通过实践斗争反抗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导致革命的爆发,同时,通过认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构理论,才能看到异化的真实存在,才会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阿格尔说:“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法是与结构危机理论相联系的,即以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为轴心,而与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的评价以及关于个人和集体解放的观点结合起来”^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变革要想成功,需要将资本主义矛盾的了解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而现实的情况是,当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不断扩大再生产和在自己获得了“火腿”,而不忘给工人分得“香肠”这样的“福利”下,工人阶级革命的斗志被资本主义隐蔽的剥削方式削弱了,没有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反而使资本主义自身的

①②④⑤⑥⑦⑧[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9、51、8、13、9、1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崩溃期限得到了延缓。因此,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看到战后资本主义的重建后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却怀疑马克思提出的危机理论。阿格尔批判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危机触发革命的决定论与政治和谐及阶级和解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悲观论之间不断交替的历史”^①。因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还没有深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意志论的观点,而是把阶级斗争的能动作用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阿格尔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俄国革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之后依然屹立,并没有放弃马克思的方法”^②。阿格尔又强调了自己的中间性立场,即“介于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认为矛盾已经被永远消除,资本主义从而可永远延续下去的马克思主义怀疑论之间的立场”^③。也就是说,阿格尔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但是仍然保留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这种立场认为资本主义具有灭亡的可能性,但是其内在矛盾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危机的出现。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生态危机与异化消费

通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和对危机理论进行重新研究,阿格尔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提出了生态危机的理论。他保留和肯定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前两个方面,但却对第三个方面危机的模式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虽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危机的趋势已经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了生态领域。因为,“今天的危机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④。阿格尔指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缺陷在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必然灭亡并没有作出明确和清楚的回答,而且,已经不适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没有预见危机的灭亡,而只是指出可能有助于形成危机和转变的方式”^⑤。所以,阿格尔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应该是在不放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异化和内在矛盾两个方面的情况下修正和补充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同时,与马克思当年对新的社会主义实现同样抱有乐观的态度,并重新考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起的危机趋势,探求变革社会的各种新的、适当的激进主义形式。对此,阿格尔以詹姆斯·奥康纳创立的财政危机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拉尔夫·米利班德等人创立的合法性危机两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为例证,说明了以上两种危机都“把危机的场所由经济本身转移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领域”^⑥。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膨胀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财政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征收税收为的是更好履行其干预的职责,而合法性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与大多数西方国家自由经营的意识形态是不协调的,这样必然导致雇佣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抱有任何希望。阿格尔指出生态危机理论与财政危机理论、合法性危机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尽管财政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现在却需要新的形式,于是,他又提出了生态危机这一新的危机理论,并且由此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阿格尔说:“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这种生态危机论,或我们所说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限制工业增长的迫切要求将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也许会迫使人们对作为资本

①②③④⑤⑥[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15、22、19—20、414、109、419页。

主义文明的目标和方法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①。

可见,阿格尔提出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从更深层次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应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从而抑制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面临走向灭亡的危机。一言以蔽之,阿格尔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只是从生态学角度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然而,阿格尔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修改和补充并不仅限于提出了生态危机理论,还深度剖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得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异化消费这样一个结论。关于异化消费的思想,早在与阿格尔并肩的另一位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斯 1976 年出版的《满足的极限》中有所阐述,他说:“人们居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的处理都依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遇的挫折,因此,人们便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和幸福等同起来,换句话说,只用消费的数量作为衡量自己幸福与否的尺度”^②。结果是,人们在追捧消费的过程中,将自然界作为了“资源宝库”和“垃圾场”,并没有感到幸福,反而感到愈发不幸。因为人们只注重满足需求的主体性和具体形式,没有考虑个人的实际需要和真正的社会意义,尤其忽视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实际上,“人类社会已有的任意一种需要模式都会对自然界的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到来,这种影响力也急剧增强”^③。因此,莱斯主张人类应该再从消费领域重返到生产领域去寻找幸福和满足。后来,阿格尔极力推崇莱斯异化消费的观点,继续把异化消费理论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他认为马克思忽视了消费领域存在的危机趋势,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利用自身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内在的矛盾得到了继续生存的能力。另外,在马克思著作发表的时代,商品和需求之间还没有发达到因广告的出现而如此复杂的地步。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情况却改变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人们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消费。而这种异化消费不是消费者对产品本身的真实需求,而是人们逃避单调乏味,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购买本不需要的商品,从而获得一种心理满足的补偿方式,这种方式往往只是根据人们疯狂的消费来衡量人的幸福和满足,产生复杂而混乱的现象,这是异化现象出现在消费领域的表现。阿格尔解释说:“换句话说,一个可能并不喜爱自己职业的人,往往会为消费名牌商品而努力工作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名牌商品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时尚带头人在市场确定的流行趋势,一会儿失去魅力,一会儿又有了魅力”^④。可见,人们在厌烦的劳动中寻求刺激性消费而获得的满足感决定了这种异化消费必然是与异化劳动是相联系的。“这种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但它反过来又刺激了异化劳动,二者相辅相成的”^⑤。所以,雇佣劳动者“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一句话,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⑥。这样,“异化也表现为人们对劳动领域感到不满,因而相应地表现为对完全从受广告操纵的商品消费中获得意义的趋势感到不满。人们为闲暇时而活着,因为只有这时他们可以逃避高度协调的和集中的生产过程(不管是蓝领工人还是白领工人都是如此),而且这时他们可以通过消费实现自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创造性”^⑦。然而,人们在劳动中承受的痛苦越多,追求的消费越多,人对自然的占有欲就越强,破坏性就越大。这样,必然威胁到生态环境,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

总之,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异化消费造成的,异化消费也与过度生产紧密相连,过度生产也必然

①④⑥⑦[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 420、476、493、495 页。

②曾枝盛:《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的最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3 页。

③解宝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名著导读》,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5 页。

⑤曾枝盛:《20 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43 页。

超出大自然的承载能力,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它并不能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中遭遇的不幸。所以,真正损害生态环境的正是这种为了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而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因此,阿格尔强调:“生态危机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为适合,它将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战略提供具体的经验的展望”^①。可以看出,阿格尔从生态视角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启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生态危机理论的产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伴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域和重心也随之而改变”^②。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变革异化的社会

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理论将更适应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异化消费则最终会为社会主义的变革模式提供战略性的经验,这种新的变革模式称之为“期望破灭了辩证法”,而这一模式有助于“稳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人们本来可以从繁荣的工业社会获得商品的满足感消失了,最终人们放弃了以广告为媒介的不合理的消费方式,而从简朴的生活中获得乐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倒退到前工业化不追求物质丰裕的时代,也不是想提出一套明确的“真实需求”,而是能够看到在进行社会变革中有力的动力,看到人的幸福是将是有益的消费与自我实现的劳动相结合。这样,人们将形成新的价值观和愿望,人们会为克服生态危机,从新的灵活性的劳动中获得幸福和满足。所以说,“期望破灭了辩证法第一可以导致人的需求的重新表达;第二可以使人们对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改变看法”^③。于是,可以创造一个经济无增长且能够使人们在生产中实现自我表达的非异化的社会。阿格尔也指出,非异化的社会里,人们会为了争取小规模、分散化、非官僚主义、非极权化的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产生变革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化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④。这种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正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所需要的,而这种“稳态经济”则有助于社会发展。

关于“稳态经济”的观点,阿格尔认为20世纪80年代莱斯对“稳态经济”论述的最为充分和详细,而他自己则是继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早期生态运动罗马俱乐部组织团体和另一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斯之后又一位赞同并强调“稳态经济”观点的学者,并且这一理论要求对社会结构进行变革,使人们摆脱异化消费的需求和消除劳动分工,建立人们自主、共同劳动的模式,降低对市场交换的依赖性,建立分散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用新的节约精神代替高污染、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肯定科学技术本身象征现代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反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不合理操控。总之,“稳态经济”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⑤。此外,阿格尔还赞同E. 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观点,指出舒马赫的观点并不是激进的,也没有把小规模技术与社会政治制度变革联系起来,认为舒马赫的小规模技术思想是可以激进化的。因为“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⑥。他反对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化”和“科学管理”理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度集中化,揭示了南斯拉夫工人管理

①③④[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0、499、499—500页。

②穆艳杰:《从政经批判到生态批判——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术交流》2009年第10期。

⑤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6页。

⑥[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501页。

模式的劳动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实现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反对韦伯方案的等级制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会使工人处于被束缚的地位,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下劳动的破碎化,压制了工人创造性的发挥;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官僚化的,高度集中的,工人阶级仍然被控制在异化的生产制度之下,而南斯拉夫的所有制虽然根植于工人管理,但是,他们的工业技术没有完全分散化,“劳动过程尚没有实现非官僚化。企业中尚存在破碎化的分工。还存在着权力和决策的官僚化”^①。

因此,阿格尔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生态危机理论结合起来,把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工的非官僚化结合起来,并且设想一种节约能源的社会主义——培养生态意识的理想温床——既能解决生态问题也能反对异化消费现象。但是,阿格尔的态度是悲观的,他认为人们在没有意识到生产与消费在生活中关联性之前,是不会正确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设想摆脱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与生态危机趋势批判相协调,听起来比较乐观,但实际上没有实现这种和谐的纲领,也并不那么信心十足。所以,阿格尔说:“我们对非极权的、生态健全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动力是乐观的,如果我们感到悲观,那是因为当代的权利和意识形态的现实似乎会阻碍这一理论的实现”^②。

因此,阿格尔提出变革社会的动力源于人们新的需求结构与新的意识形态。虽然人们对阿格尔提出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观点并不十分乐观,但是它却重新燃起了变革社会的希望。因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根植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③。因此,阿格尔强调建立新的需求结构的必要性,从而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危机与社会主义阶级激进主义的需求提供联系的环节。阿格尔超越了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又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之处在于将人的一切活动看作是受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对现存社会制度抽象否定性批判只能产生微弱的革命力量。新的危机趋势可以产生新的需求,从而提供变革社会的动力,然而,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没有能够预见资本主义晚期将会出现新的危机趋势,也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需求结构,结果却出现了马尔库塞“虚假需求”的现象。人们本以为盲目追求消费的“虚假需求”可以补偿在异化劳动中的不满足感,但是资本主义却不能对这种需求持续供给,于是人们沉溺于消费领域的期望最终破灭了,必须对资本主义和自身的行为重新反思,直到变革社会的社会主义阶级激进主义的意识真正觉醒。

对此,阿格尔进一步主张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嫁接到北美民粹主义上,极力寻求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结合这样一个新的解放意识形态。阿格尔认为社会的变革先从反对官僚化的观念入手,因为北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比较薄弱,先批判官僚主义,解放意识形态,再返回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新的意识形态期望建立在非官僚化和小规模、分散化的制度上,并且将人从支配中获得解放。因此,阿格尔希望北美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官僚化和集权制的失落感和不信任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产生变革社会的动力。同时,美国也缺少左翼的政治思想,也需要将民粹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激进的目的相辅相成。“美国政治生活的由来已久的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三项基本要求为基础的生态激进主义。美国民粹主义所缺少的(无论右翼还是其左翼)是社会主义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去,以提供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借助民粹主义对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满和怀疑情绪的因素,产生激进主义的变革社会的前进动力。倘若如此,可能产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乐观态度。因此,阿格尔说:“民粹主义(破灭了的消费者期望)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可以通过正确评价

①②③④[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504、508、486、510—511页。

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努力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前景而结合在一起”^①。

四、结语

阿格尔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一位杰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用生态危机理论修正和补充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不足,但他并不是完全否定马克思,而是肯定马克思的辩证法,将异化思想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异化消费,从而揭示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深层次的矛盾关系,走向了非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非马克思主义意志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阿格尔提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赞同实行“稳态经济”的发展方式,并且倾力奋斗的地域是北美洲,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美国化,“醉心于‘北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②,从这点上看,这是他超越威廉·莱斯的独特和可贵之处。同时,阿格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转向变革奠定了思想的契机,也为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但是,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他过于强调生态危机而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甚至提出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这难免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潜在的危机;其次,他提出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带有主观性,缺乏客观依据,也没有沿着莱斯设想的从消费领域重返生产领域去寻找幸福和满足的方案走下去,实质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最后,从长远来看,他提出的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方式也无法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必然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之,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根源于他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是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强调生产方式不仅是社会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基础,也决定着社会的性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是推动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有力杠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责任编辑:杨嵘均)

Inherent Logic of Ben Agger's Ecological Marxism

MU Yan-jie, LIAO Ji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ecological Marxism was first proposed by Ben Agger. His theory of ecological crisis is a supplement to the theory of Marx's economic crisis. Agger not only thinks that Marx's theory of dialectic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heory of the ecological Marxism, but also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replacing the economic crisis with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deems that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rooted in the alienation of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Agger advances “the dialectics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 thus ushering in a new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m. Through examining Agger's theoriza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in his book *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 we hope to reveal the inherent logic of his ecological Marxism and accordingly to grasp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his ecological Marxism.

Key words: Ben Agger; ecological Marxism; inherent logic

①[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 519 页。

②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第 407 页。